



## 沈毓桂與《萬國公報》

易惠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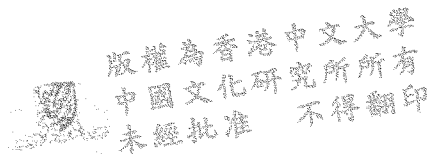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萬國公報》在西學東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的影響和作用，愈來愈為中外史學界、思想史學界等所重視。不過，一般研究《萬國公報》的學者，都把重點放在辦報人或主持人林樂知的身上，而不太重視對《萬國公報》不同時期的幾位主編（如沈毓桂、蔡爾康等人）的研究。這樣，研究《萬國公報》就有欠全面。本文旨在對擔任《萬國公報》主編任期最長的沈毓桂與《萬國公報》的關係作一探索，並通過此一探索，附帶說明兩個問題：一、西方社會福音派傳教士在宣傳西學時如何依靠華人知識分子；二、華人知識分子在西學東漸史上起了怎樣的作用。

沈毓桂(1807—1907)，江蘇吳江人，字壽康，號贅翁、匏隱氏，其他還有字、號、筆名多達六十餘個。1859年沈毓桂到上海，結識了艾約瑟、慕維廉、偉烈亞力、林樂知等西方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從此涉足於這些傳教士在華的文化傳播活動，歷五十年而不改其業。他與林樂知共同辦理《萬國公報》，則是他這五十年中最主要的貢獻。

沈毓桂在《萬國公報》<sup>1</sup>中的職責和地位，在他本人的自述及包括林樂知在內的同時代人的文字中都有明確的交代，但是他何時進入報館卻被忽略了，不過這點可以從一些間接的資料中推斷出一個大概時間。1880年5月，沈毓桂的《送美國藍惠連先生回國》詩在《公報》上發表，其中有句云：「我襄《公報》年多久，林君游向燕京走。藍君代理三月餘，得時親近真合手。」指的是1869年底林樂知去北京等地遊歷，離滬的三個月期間他將當時的《教會新報》托付於本教會的同事藍惠連一事。從詩所反映出的時間看，沈毓桂應是1868年9月林樂知創辦《教會新報》時就受聘入報館參與報社工作的。

1 以下簡稱《公報》。



沈毓桂自受聘於林樂知後就再未離去，他此後在報社職責的變遷可由他本人的自述得知。1894年2月《公報》復刊第61期刊載他的署名文章《辭〈萬國公報〉主筆啟》，以一千多字的篇幅客觀而完整地回顧了自己與《公報》二十年的關係，為自己二十年的報業編輯生涯作了總結：

余交林君爲之襄理報牘，<sup>2</sup>在林君創行《新報》之五年。……然《新報》編訂之初，國事與教事尚合而一之，而教事較國事爲尤重，……無怪乎閱報諸君，意有所偏注。且中西和議既成以後，不獨中國與西國交涉之事日增，即西國與西國亦各有交涉之事，迥非昔時可比。《新報》篇幅有限，勢難遍收，自不得不擇人所願觀而登之，以快衆覽，此又易《新報》爲《公報》，並多載國事之所由來也。余爲林君主張《公報》者，曩時約計五年，一以西報爲準，不敢攻訐隱私，存厚道也；不敢顛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傾軋以自標榜，則以其非循分之道而戒之也。……蓋林君之不欲偶軼報例，與余不欲稍負林君，此數年中先後有如一日，固彼此有可印證，故無俟余之贅述者也。……自中曆光緒九年之春，暫將《公報》中止，不再編輯。……如是者五年，西國名流復於滬上會議，……囑林君暨余仍主報務。……自時厥後，又閱五年，得《公報》六十冊矣。望九衰翁，心血久竭，當即告之林君，苦辭此席。至六十一冊始，即望聘請鴻儒碩彥爲之主理報務。

沈毓桂以當事人的口吻將《公報》自創刊至1894年的演變歷史作了一番交代，其中也穿插著他本人在《公報》中職責的改變。不過他沒有從自己初入報社談起，而是從《教會新報》<sup>3</sup>創刊的第五年（即1872年）開始談。所謂「襄理報牘」，並非從事一般的編輯職務，而是作爲僅次於報館主持人林樂知的編輯人員，即「主筆」。其間經歷了《新報》至《公報》的更名，後來又接著「爲林君主張《公報》者，曩時約計五年」，這裏五年是以《公報》1883年秋停刊爲斷。因此起始即爲1878年夏秋之間，當時「主張《公報》」，必不同於前此的「襄理報牘」。從「一以西報爲準」，用第一人稱敘述其間《公報》的報務工作的口氣，顯見「主張」乃是「主編」之意。從1883年《公報》停刊到1888年討論復刊，歷時五年；1889年復刊到1894年辭職，他又有五年的主編經歷。

這裏沈毓桂的自述，時間上和職責區別上均十分嚴謹，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可以據此清理出他編輯生涯的綫索：1868至1872年爲《教會新報》一般編輯，歷時四年；1872至

2 字下重點符號爲引者所加，以下同。

3 以下簡稱《新報》。

1878年昇任報紙主筆，歷時六年；1878至1883年任報紙主編，歷時五年；1889至1894年又繼任主編五年，總共有二十年的編輯生涯，任報館主筆以上的職責有十六年。

自1894年後，沈毓桂發表的文章都自稱曾任《公報》主筆，如發表於1894年7月《公報》復刊第66期的《羅景堂先生小傳》，便曾說過「余應美國進士林君樂知之聘，謬掌中西書院，兼充《公報》主筆」。

在上引沈毓桂的自述中，他是將自己不同時期擔任主筆的兩層不完全相同的職責含義區分清楚的：單純的主筆和主編兼主筆。而其他當事人談到這個問題時則是籠統言之。林樂知1906年12月在《公報》復刊第215期上發表的《褒揚耆儒奏折書後》說：「余創《萬國公報》，亦中國華字報之先河，特請先生主筆十有八載。」1891年7月林樂知婉拒沈毓桂第一次辭《公報》主編職時，在《公報》上發表《藉伸謝悃》，說：

前編輯《萬國公報》，有條不紊，不為通人所詬病者，咸惟先生是賴。今重輯報章，又二載有半矣。體裁益為精審，一時幾於不脛而走，而先生之心思才力於是亦耗費盡矣。……先生文場耆宿，交游衆多。務祈先生代覓其人，庶後此永守前規，而樂知亦藉臂指之助，諒先生自必樂於玉成也。

這裏林樂知所提到沈毓桂對《公報》的作用，內容與1894年沈毓桂的自述是相一致的，即沈是對《公報》整體負責的。沈毓桂當時在《公報》中的職責甚重，林樂知當然不願意讓他從報務中脫身，其實當時他已是八十四歲的老翁了，林樂知還委託他代覓主編的後繼人選。

《公報》在沈毓桂辭職後的主編蔡爾康確是沈毓桂向林樂知推薦的。蔡爾康作為後繼的主編，在1897年7月《公報》復刊第200期上發表《〈萬國公報〉百卷慶成記》。他在回顧《公報》歷史時說到：「沈贅翁先生毓桂實掌華文，迨十有八年。」

這些直接參與《公報》出版的人都一致肯定沈毓桂在《公報》的主編或主筆地位。這裏唯一還需澄清一下的是主編或主筆時間的長短，沈毓桂的自述中合計為十六年，而林樂知與蔡爾康則同稱十八年，其中的差異是因為沈毓桂是按實足年數算，而林樂知、蔡爾康則可能是按任職跨入的年度算，因此沈毓桂的自述比較合理。

## 二

沈毓桂1878年後在《公報》的職務是主筆兼主編，除了根據他的自述可作如此推斷外，

4 此處「先生」是指沈毓桂，下段「先生」亦同。

從《公報》在1878年發生的人事變動以及此後在《公報》版面上顯露出來的變化也可與這一說法印證。

1878年3月，林樂知回美國參加四年一度的美南監理會代表大會，把《公報》轉交美長老會在滬的傳教士陸佩代理。陸佩主持出版的《公報》第480至496期，宗教傾向性明顯加重，外來稿件刊載量減少。陸佩不久因病回美國，又將《公報》轉交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慕維廉代理。慕維廉是與林樂知相似的社會福音派傳教士，從《教會新報》起就長期為報紙撰稿，並從1875年起聘任沈毓桂為中文翻譯。兩人長期合作譯介西書，撰文鼓吹變革中國，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1900年慕維廉去世。慕維廉在這樣的人事背景下代理《公報》，他對沈毓桂的信賴和倚重自然非同一般。慕維廉主持出版的《公報》第496至516期，又從陸佩代理時的以教事為主變回到以政事為主。慕維廉、沈毓桂兩人還推出兩項引人注目的版面改革措施：一、在《公報》首頁闢「公報弁言」一欄，猶如現代報紙的社論欄，屬時政評論性質。二、《公報》版面實行分類編排，分政事、教事、各國新聞、雜說幾大類，這種分類法在《公報》更名初期曾作為設想提出過，但未實行，這次實行後一直保持到1881年。1889年《公報》復刊後又實行這種版面分類編排，只是「公報弁言」在林樂知回滬重主《公報》起就不再出現。

林樂知以這次回美活動為契機，自此從《公報》主編的職務上脫身。儘管林樂知從第517期開始又重新主持報務，但並未再同時承擔主編職責，所以如此是由發生在林樂知身上的一些客觀因素促成的。

當時美南監理會在中國的傳教工作沒有具體的負責人，林樂知1878年回美參加代表大會後返滬，即肩負母會的使命，在本教會中傳教事務方面的職責和工作範圍都增大，到1881年更正式由美國母會任命為美南監理會在上海教區的負責人——傳教督察。《教會新報》創刊前林樂知已經在清政府的廣方言館任教，自1871年起又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任譯員。當時林樂知在譯書館的同事傅蘭雅後來曾這樣描述林樂知當時的工作情況：「林樂知當時工作極度緊張，晝夜不息，無間風雨，每日上午在廣方言館授課，午後赴製造局譯書，夜間編輯《萬國公報》，禮拜日則盡日說教及處理教會事務，同事十年從未見其有片刻閑暇。」<sup>5</sup>1878年後，教會事務的職責和工作明顯加重，林樂知勢必放棄部分世俗性工作，但當時他並未馬上離開廣方言館和譯書館，在這兩個職位上他一直堅持到1881年，這是一定的經濟原因的。對於林樂知來說，雖然由於美國南北戰爭引起的傳教經費無著的情況

5 林治平編《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77年，頁130。

已經結束，但因為作為他私人事業的《公報》始終受到經費壓力，靠他多方爭取到美國母會和其他傳教協會的資助才得以勉強維持收支平衡，加以他的幾個子女在美國唸書，自己的經濟狀況也不寬裕，在中國官方機構中任職的豐厚收入對他自然有相當的吸引力。他曾在寫與美國親朋的信中高興地談到這些收入折合的美金數，還自豪地提及清廷由於他在官方機構任職授與他五品官銜。種種因素都促使林樂知留在中國官方機構任職，於是唯一可脫身出來的只有《公報》。《公報》經營順利，又有可靠的經辦人——他離滬期間《公報》的實際情況已經給他以這種印象。

1878年11月後林樂知已把報務交由沈毓桂直接主理，這從報紙版面上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可以得到證實。在這之前，《公報》(包括《新報》)的編輯部正式文章(告白、啟事、詩除外)均不署名，因此沈毓桂的名字(包括筆名)並不出現在《公報》他所執筆的文章上，但在此時這一慣例被打破了。《公報》第533期出現了沈毓桂第一篇署名文章《勸士習當今有用之學論》(署筆名「稍知時務者」)。此後，《公報》大量發表了署沈毓桂名的文章。儘管這一時期沈毓桂的文章還都署筆名及他的字、號，難以引起讀者對他個人的注目，但這畢竟意味着他已從受林樂知授意轉變為完全獨立的撰文，這對於他在《公報》中地位和作用的轉變是一個重要的標識。

### 三

沈毓桂接替林樂知擔任《公報》的主編兼主筆，並不意味林樂知在《公報》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只是此後他已不處身在那種對《公報》前有悉心授意指導，後有認真審閱把關的主編地位。他只是從主辦人的角度對《公報》作全局性的統籌安排，以及留心《公報》的經營狀況。

林樂知能在此時放心將《公報》主編職責委諸沈毓桂，是從對沈毓桂有相當認識的基礎上出發的。

從《教會新報》創刊起，報館就一直聘用兩名華人助手，沈毓桂之外的另一名華人助手曾經數度更換，在《新報》時期有案可查的即有兩次。1869年9月間《新報》載啟事稱第52期以前的襄理人「以無暇而去」，已另請一人襄理，又提及前此《新報》的訛誤較多。1872年9月間《新報》刊載林樂知的啟事說：「原只以本館佐理筆墨者任意刪改來稿，不協輿情，……現佐理筆墨之華友已赴山西，不在此矣。」很可能就是這次人事變動導致沈毓桂昇任報館主筆。

從上述兩例可以看出，林樂知辦事認真，對雇員嚴厲。他長期留用沈毓桂，並不時予以擢昇，是以沈毓桂的才識和品格為基礎的。林樂知於1891年寫的《藉伸謝悃》曾這樣描述沈毓桂的處事為人：「先生為人外和而內介，謹小而慎微，文亦如其為人，不欲為放言高

論，而曲盡事理，約而要簡。」這自然也是林樂知所看重之處，不過這還僅是較次要的一個方面。

林樂知萬里迢迢來華，目的在幹一番事業；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自有必要借助華人。他對中國和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有一定的認識，對自己的助手也有一定的看法。他對華人助手也另有一套要求，不但要能接受以基督教爲代表的全部西方文化，還要對中國的傳統社會和文化有深刻的認識和了解。他對華人助手的這種要求明顯地表現在他對1880年代中期由美國母會派遣回國的華人傳教士宋耀如的態度上。在宋耀如到達上海的前兩天，他給美國母會去信說：「我們中西書院的青年學者比他要强得多了——我指的是學得好的人——他們學貫中西。……宋是永無指望成爲這樣的中國學者的，他充其量只是一名失去民族特徵的華人，除非給他的職務和薪俸遠遠超過他的貢獻，否則他是不會感到滿意和高興的。而結果，如我所知，我們當中誰都不會要他。」<sup>6</sup>從這裏可以看到林樂知個性中自負和專斷的一面，但這並不是他對宋耀如個人有成見，因爲他與宋耀如當時還未見過面，也沒有來往。

沈毓桂在當時的中國是符合林樂知條件的不可多得的一位。他中學淵博，「爲世所欽」，林樂知「尤敬佩之」。沈毓桂年長，閱歷豐富，對中國傳統社會有相當的了解，本身又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更難得的，正如林樂知所說：「當咸同之際，中西隔閡，民智未開，先生早以先知先覺爲己任，五十年來不變宗旨。」對中西交往的態度，「尤能力持大體，不涉偏頗」。<sup>7</sup>這一切都是林樂知能放心地將《公報》主編委諸沈毓桂的重要基礎。

#### 四

沈毓桂1894年結束《公報》編輯生涯時，認爲《公報》應該「一以西報爲準」。1883年他在《公報》發表的《〈近事要務〉衍義·開報館以廣見聞》中稱西方報紙「上自朝廷之政事、官吏之賢否，下及工商之攸繫、風俗之要端，以及忠孝節義之道、天文地理之詣、鳥獸草木之異、名物象數之繁，並論格致，談時勢，明醫術，傳教道，莫不一一詳載」。這些議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當時對報業的觀點及主編報紙的理想。但是在近代報業剛起步的時代，中國還是在實施封建專制，他主編一份帶有宗教背景的報紙，所面臨的主客觀條件都不允許也不可能讓他完全實踐他的報業理想。

辦好一份報紙，關鍵在於是否能網羅吸引一批爲報紙撰稿的作者。《公報》的讀者對象

6 轉引自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86年，頁70。

7 林樂知《褒揚耆儒奏折書後》，《公報》復刊第215期，1906年12月。

是中國知識界，本該多用華人外稿，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從《新報》時期開始，華人外稿就比重不大，《公報》直到停刊前（1883年8月），華人外稿的情況也不比《新報》有根本性的好轉。筆者統計了1874至1883年，即《公報》第301期（《新報》更名為《公報》時）到第750期（《公報》停刊時），華人作者388人，西人作者32人。華人外稿作者人數大大多於西人，但多數稿件篇幅短，質量低，儘管有的作者發表多至數十篇文章，但就作品價值來說，能與西方作者相匹敵的幾乎沒有，這些華人作者而且以基督教徒居多。面對這種情況，爲了吸引有水準的稿件，也爲了活躍報紙，《公報》曾舉辦兩次設獎的擬題徵文活動。將題目在《公報》上公佈，並作範文示例，歡迎讀者按題作文投稿。《公報》則經過評定之後發給獎金，並在《公報》上刊登這些獲獎作品。這兩次徵文的內容都與中西交往有關，第632期《公報》的徵文題目是：《富國要策》、《風水辟謬》、《中西相交之益》、《崇事偶像之害》、《耶穌聖教中國所不可缺》；第666期《公報》的徵文題目是：《中西書院之益》、《中西通商之益》、《中外往來之益》。從在《公報》上發表的獲獎文章看，無論篇幅和質量都比平常的華人外稿要好，徵文活動確實吸引一批既有水準又開明的知識分子盡心爲《公報》著文。這時期的佳作有金琬所撰連載五期的《富國要策》、朱逢甲所撰連載六期的《富國要策》等等。由徵文獲獎作品可以看到一個普遍現象，即在很大程度上模仿《公報》以前的作品，有的甚至抄襲《公報》作品的字句，可見應徵者多數對西學認識不深。但徵文活動畢竟吸引和鍛煉了一批熱心西學的知識分子，爲《公報》培養出一批華人外稿作者。值得強調的是，爲擬題徵文活動而在《公報》發刊的範文，大都由沈毓桂所作，如《公報》第649期他以「古吳志道老人」署名發表的《中西相交之益》，公報第711期以「南溪居士」署名發表的《中外往來有益論》等。

華人作者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華人讀者的情況，此時期《公報》的讀者仍以教徒佔多數。當時《公報》有一定數量的洋務官員作爲熱心讀者，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也有一定數量的中下層知識分子讀者；但總的來說，《公報》還未能在中國知識界中吸引到足夠數量的讀者。1883年《公報》停刊前華人外稿始終是薄弱的，因而造成了《公報》版面上西方傳教士的文章、轉載文章、沈毓桂與編輯部的文章三分秋色的局面，這些文章共同確定了《公報》的整體形象。

西方傳教士作品的情況可以從1881年4月《公報》的《本館小啟》知道大概：

啟者，本館倡設《萬國公報》迄今十有三年矣。茲蒙西國諸名士允寄大稿，如北京艾約瑟、德貞、山東韋廉臣、狄考文、山西李提摩太、漢臬楊格非、廣東花之安、上海慕維廉、潘慎文及本館主。各分題目潛心著作，一俟匯齊，按期分列於報，以冀廣傳於天下，俾閱報者獲益於無窮矣。至局中一切事務皆本館主操權，倘蒙華士賜我佳章，不勝欣幸。凡通商諸埠經理售報諸友，務祈推廣爲感，特此預聞。

可見《公報》的作者主要是西方傳教士，其中幾位著名的社會福音派傳教士更是《公報》長期的特約撰稿人。他們按照自己的所長，「各分題目，潛心著作」。上面啟事中的用語「倘蒙

華士賜我佳章，不勝欣幸」，表現出《公報》雖然希望華人知識分子來稿，但也未寄予厚望。

傳教士及西方人的作品除德貞是醫學題材，楊格非、潘慎文是純宗教題材，其他各位的作品都分別涉及到西學、時政、宗教諸領域，只是各人論述的深度不同而已。他們大多熱衷於鼓吹中國興辦洋務事業和變革教育，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作品。

轉載文章分兩類，其一是從其他報刊中選擇適合自己格調的作品全文轉載，主要是選自《申報》、《循環日報》等。選自《申報》的文章集中在開礦、製造以及學習西方語言等洋務西學上；而選自《循環日報》的則集中在中外關係的討論上，如《論俄人專意鐵路，中國不可不備》、《跋論琉球事書後》等等。這些全文轉載的文章雖然篇幅不長，但與當時中國的內外形勢背景密切聯繫，質量又高，影響力不可忽視。其二是轉載成書，這是《新報》時期即有的傳統，不過那時轉載的主要是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譯作，《公報》時期則主要是轉載中國先進思想界宣傳西學、西政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當屬1877年《公報》第441到450期連載的郭嵩燾的《使西紀程》。本來《使西紀程》已由總理衙門排版，準備印刷發至各級官吏，宣傳西方事情，後來由於清廷內部保守派的強烈反對而致毀版。當時《公報》不顧清廷的禁令，全文發表《使西紀程》，因此得以在社會上流傳下來。1878年9月沈毓桂又在《公報》上轉載了另一部中國人介紹西方的著名作品——李圭的《環游地球新錄》。該書詳細介紹了美國1876年費城萬國博覽會的盛況，以及作者遊覽美國華盛頓、紐約、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的情況。書中對美國的機器製造、男女平等、醫院、監獄等社會設施和現象表示好感。書有李鴻章作序，由總理衙門出資刊印三千部在書坊出售，《公報》轉載又擴大了該書在社會上的影響。除了這種中國人作的介紹西方的遊記作品外，《公報》還轉載中國人作的對西學、洋務有深刻思考的理論性作品，如鄭觀應的《西學》，以及輪船招商局、機器織布局、採礦局等洋務事業有關的文件，以示對洋務事業發展的鼓舞。

沈毓桂擔任《公報》的主編和主筆時，他的署名文章（共二百多篇）對於《公報》總體形象的樹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時的《公報》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有時甚至一期數篇。他這一時期文章的主要內容涉及以下幾個方面：一、批判中國吏治黑暗等社會弊端；二、批判科舉，倡導新式教育；三、鼓吹中西正常外交；四、鼓吹興辦洋務事業及社會變革；五、宣傳基督教義。沈毓桂是當時《公報》唯一能與西方作者相匹敵的華人作家，他的文章不只數量多，在思想水平上與林樂知等西方傳教士的作品相比也是毫無遜色的。

從上述影響《公報》整體形象的三類作品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沈毓桂作為《公報》主編的作用與價值。在吸引西方傳教士來稿方面，林樂知的作用應該大於沈毓桂；但考慮到沈毓桂本人與這些傳教士長時間的私人交往，他的影響和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至於《公報》的轉載作品，就要靠沈毓桂及時留心社會及在各類中文報刊中廣採博取了。



爲了進一步探討1878至1883年間《公報》的演變，以及1883年《公報》停刊的真實原因，借用美國學者本奈特(A. A. Bennett)的研究成果，將《公報》此時期各類題材逐年在篇幅上的比例匯製成表：<sup>8</sup>

年分	分類	宗教題材	世俗新聞	科技題材	時政評論	備 注
1874—1875		12	75	6	7	首欄刊出京報一週的全部內容
1875—1876		13	73	4	10	同上
1876—1877		8	72	1	19	同上
1877—1878		31	44	2	23	末欄選錄京報內容
1878—1879		25	62	3	10	同上
1879—1880		16	32	3	49	自此不再刊登京報內容
1880—1881		25	23	2	48	
1881—1882		11	25	7	57	
1882—1883		33	35	6	26	

本奈特將《公報》的內容分成四類：宗教、世俗新聞、科技、時政評論，根據每類文章在報上的行數進行統計。但這種分類方法實在不夠精密，比如一篇文章是否算是宗教題材就很難判斷，尤其是傳教士的作品中，西學傳播和宗教宣傳常常是混雜成一體的。儘管如此，統計表仍然基本上反映了1874至1883年間《公報》的整體形象和版面傾向的演變。從中可以

8 本表根據A. A. 本奈特《傳教報人在中國——林樂知和他的雜誌1860—1883》(亞特蘭大：喬治亞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150—151頁資料製作。

看到沈毓桂任主編的這段時期，《公報》愈來愈世俗化，漸漸從新聞類轉變為時政評論類。這一結局是圍繞《公報》的一系列主客觀因素促成的。

1870年代《公報》的經營狀況雖然良好，但始終未能解決經費的問題。隨着報業競爭的出現，經費不足的情況更日趨嚴重。第一，自1870年代中期以來《公報》每期發行量就停滯在二千份左右，這一發行量是不足以使《公報》完全自給自足的。《公報》每年都依賴教會的資助來彌補虧損，根本無力發展。林樂知、沈毓桂幾度試圖擴大版面，都因怕漲價會失去訂戶而作罷。第二，《公報》面對的是兩種有不同趣味和追求的讀者羣：傳統教會影響下的教徒和開明的知識分子，《公報》編輯處於無法調和這兩種讀者要求的困境。《公報》第545期上《本館第十二年接辦新式〈萬國公報〉告白》即反映了這點：

閱報諸君當亦知我衷曲矣，惟是看報之費每年價洋一元，在作者虧本已多，而閱者尤嫌價貴，此立報之所以難也。且報中所登各件教事、政事兼而有之，論政事而欲觀教事者，多不滿意；論教事而欲觀政事者，難以悅心，此棄彼取，彼棄此取，作者將何所適從耶？殊不知觀政事報者，天文、地理、格致外，復有教事列於其中，亦可知教事之有益而顯其不易不偏之見也。觀教事報者除論教規教法外，復有政事載於內，亦可知政事之大局，而並無畸輕畸重之情也。

《公報》在經營和編輯上的困難，迫使《公報》的主持人和主編必須有所行動。首先《公報》減少刊登新聞類的文章。由於各類中文報紙相繼出現，中國政府又主辦了專刊西方新聞的《西國近事匯編》，《公報》不得不大幅度削減新聞篇幅，以求辦出自己的特色，適應社會與讀者的需要，擴大銷路。削減新聞後《公報》是偏向教徒？還是偏向開明的知識分子？這便由沈毓桂和林樂知對中國問題的一貫看法以及他們對變革中國社會的理想所決定，他們選擇了後者。為了使中國洋務運動能夠不斷發展，有必要進行廣泛的鼓動宣傳。此外，運動中暴露出來的缺陷已為中外人士所注目，因此《公報》開始針對洋務運動的缺陷，把議題集中在批判科舉制度、變革舊教育、培養新式人才等問題上。

儘管《公報》偏向於開明的知識分子，但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對於仍然生活在傳統社會中的廣大中下層知識分子，《公報》並未能吸引到足夠數量的讀者。這種情況自然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整體在學習西方的道路上步履緩慢，更反映了身處中法戰爭前夕的中國知識界在外憂內患相對緩和的社會條件下，對時局的緊迫感及對清政府的失望感也漸趨平緩。中國社會當時確實有一股辦實業自強的思潮，但熱心於此的開明知識分子為數並不多，整個中國知識界、思想界當時正處於相對沈寂的時期。總之，沈毓桂、林樂知在作出抉擇時，對中國知識分子估計過高，對有宗教背景的《公報》打入中國知識界的困難又估計過低。

《公報》無法在開明的知識分子中爭取到新訂戶，同時卻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很多教徒訂戶。《公報》不但在經費上依靠教會資助，在發行上也主要依賴各地新教的教堂和教會學校

代理，但是《公報》辦報方針偏離傳統教會，使《公報》與教會之間產生難以彌補的裂痕。《公報》在1880年代初發行量日趨下降，到1882年已降至1,600份。1882年5月在山東傳教的韋廉臣寫信給林樂知說：「[報紙]相當不易出售，過期的報紙更是如此，原因在於報紙本身。」報紙文章的質量「嚴重阻礙了它的發行」。<sup>9</sup>可以看到傳統教會對《公報》內容的改變不滿。報紙銷售量下降直接威脅到《公報》的生存，迫於現實，《公報》再度調整各類文章的比例。1882至1883年度《公報》大量發表屬於宗教題材的文章，但這一應急措施並不能馬上使發行量回升，也未能彌補《公報》與傳統教會的裂痕。1883年4月，英國倫敦會傳教協會每年一百鎊的專款資助到期終止。這筆捐款是林樂知在1881年爭取來的，用以每期加印800份免費向中國官員分發，目的當然是為了令基督教能夠打進士大夫階層。這更加劇了《公報》經營上的困難，最終導致停刊。1883年6月《公報》發表林樂知署名的《〈公報〉暫停小啟》說：

本館主職司教長，凡教中事務俱需經理，又擬建中西大書院，募資購地，糾工庀督，事屬創者諸形勞瘁。主筆者襄理庶事，亦虞顧後失前，不得已議將《公報》自七百五十卷後暫為停止。

林樂知以忙於創辦中西大書院來掩飾《公報》所遇到的經營困難，言下對《公報》的「主筆」沈毓桂不無責備之意。林樂知、沈毓桂兩人後來在復刊後的《公報》多次談到此次停刊，措辭委婉含蓄，但各自都帶有說不清道不盡的情緒。1894年2月沈毓桂在辭《公報》主編職時第一次以當事人身分回顧《公報》的停刊：「中曆光緒九年之春，暫將《公報》中止，不再編輯，揣林君之意，猶以未能兼顧，引為憾事。然余之精力耗散於其中者為不少矣。」沈毓桂明白地表示自己無愧於《公報》，也無愧於林樂知的重託；而林樂知在為沈毓桂的復刊辭而作的跋語中則仍堅持原來的看法：「《萬國公報》實賴先生<sup>10</sup>相助為理，嗣因議立中西書院，肄業日多，館事日繁，不暇兼顧，暫行中止。」林樂知對《公報》「不暇兼顧」是毫無疑問的，說沈毓桂「不暇兼顧」則並非事實，因為沈毓桂這一時期始終在《公報》發表大量文章，有時一期數篇，可以說他常常是創作而不是編輯出一期報紙，而林樂知此時期見諸《公報》的文字就相當少。

1894年沈毓桂正式辭去《公報》主編一職。在《辭〈萬國公報〉主筆啟》中沈毓桂再度談到自己1878至1883年間的工作：「蓋林君之不欲偶軼報例，與余不欲稍負林君，此數年中先後如一日，因彼此有所印證，故無俟余之贅述者也。」沈毓桂對《公報》停刊耿耿於懷無疑

9 同上注，頁158。

10 指沈毓桂。

說明一個事實，在《公報》當事人中沈毓桂涉嫌對停刊一事負責。儘管林樂知也有將《公報》進一步世俗化的意向，但作為責任主編的沈毓桂在具體執行中顯然操之過急，導致《公報》停刊時林樂知對他不無責備之意。

其實《公報》無論偏向宗教還是偏向時政內容都是嚴肅的，讀者對象是有一定文化水準的知識分子，這都決定在當時條件下《公報》的經營是艱難之途。到了1880年代，《公報》更同時面臨着像《申報》那樣的商業報紙，以及教會內的宗教報紙的競爭。無庸諱言，作為主編的沈毓桂，他的那種學者型的報人也不具備辦報的開拓性能力。這一時期《公報》的快速世俗化反映了他對中國知識界的估計過於樂觀，這一錯誤判斷造成《公報》經營上難以挽回的局面，結果以停刊告終。

但是《公報》作為一份高格調的時政評論報紙的形象畢竟這樣地形成了，《公報》對於中國近代社會的意義並不因停刊而有所遜色。這點從康有為1883年到上海初見《公報》就立即受到吸引，並購買了當時所能夠購買到的全部過期報紙可以得到證明。《公報》給康有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後來在戊戌變法前夕維新派強學會的機關報最初也命名為《萬國公報》。當時日本和朝鮮的政府也長期訂購《萬國公報》，《公報》甚至銷售到臺灣、香港、蒙古、新加坡、舊金山和馬來羣島等地，足見《公報》辦得相當成功。

## 六

沈毓桂主編《公報》的第二階段，就是1889年2月《公報》復刊到1894年2月辭職這一時期。

復刊後的《公報》是一份月刊，版面仍是四開本，每期三十頁，三萬多字。較之停刊前，每期容量增加很多，適合向大型時政評論性刊物發展。出版的間隔加長，反映出《公報》意圖減少新聞報導。此外，《公報》的背景也發生了變化，復刊後的《公報》成為寓華西人團體「廣學會」的機關報。

《公報》復刊後，沈毓桂與林樂知在《公報》內的關係也起了很大的變化。1891年2月後，每期《公報》的扉頁上都刊登一則相同的《公報啟事》，稱《公報》復刊「仍延請林君樂知主其事，而分任其事者為慕君維廉、艾君約瑟、丁君賾良、沈君贊翁、德君子固<sup>11</sup>、李君提摩太」。這幾位傳教士在停刊前僅是《公報》的特約撰稿人，復刊後具有了報紙的通訊編輯的意義；但是他們與停刊前一樣，仍是分居於各自的傳教地，不對《公報》的具體事務負責。林樂知仍是《公報》的主持人，只是《公報》不再是他的私人財產。沈毓桂仍任主編，負

11 即德貞。

責《公報》的具體事務。沈毓桂的名字與西方傳教士並列在一起，一同作為受廣學會聘任的人員，處在一種比較平等的關係上，這點在沈毓桂與林樂知二者地位的關係上尤其明顯。沈毓桂在辭《公報》主筆職時曾說：「西國名流復於滬上會議，……因囑林君暨余仍主報務。……余以老憊固辭，諸君均未慨允，遂乃勉勉從事。」從語意上可以感受到沈毓桂對自己在《公報》中的地位相當自信。1891年3月沈毓桂在《公報》上有詩云：「抱病轉思藏我拙，著書端欲乞人揮。」詩下自注：「《公報》、《教會報》<sup>12</sup>均余主稿，去臘因病，正月兩報倩友代編。」可見沈毓桂在處理報務工作上有相當的自主性。這些都說明沈毓桂與林樂知此時都是廣學會聘任的雇員，已經沒有以前的主僕關係了。

如果說在《公報》停刊前沈毓桂是報館業主林樂知私人雇用的主編，在《公報》內的地位始終處於林樂知的陰影之中，他與林樂知在這一時期對《公報》的實際影響力孰強孰弱尚不明朗，那麼在復刊後的這個時期，他與林樂知在《公報》處於較為平等的地位，兩人對《公報》的實際影響力的孰強孰弱就變得十分明朗了。

很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公報》的復刊辭是由沈毓桂執筆的。1889年2月復刊號首頁的《興復〈萬國公報〉序》注明是「吳江沈毓桂書於申江中西講舍」的，這無疑是公開向社會顯示沈毓桂作為《公報》主編的身分和地位。沈毓桂在復刊辭中陳述了《公報》復刊後的辦報宗旨：「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敦政本也；略譯各國瑣事，誌異聞也；其他至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學術也；算學格致務各擷其精蘊，測其源流，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皆在所不當遺也。」體現了他立意繼續停刊前的努力，將《公報》辦成時政評論刊物。林樂知僅以《公報》主持人的身分在序後附了「跋語」。

另外從林樂知1889至1894年在《公報》發表的文章看，也不得不承認在這一時期林樂知在《公報》上的實際影響力較弱。林樂知這一時期在《公報》上發表的文章僅有八篇，不僅遠少於沈毓桂，也遠少於其他傳教士，而且僅有一篇關於鴉片問題的討論涉及時政。林樂知在《公報》上發表的對中國社會有影響力的作品，早期是1875年的《中西關係略論》，後期是1894至1898年的《中東戰紀本末》，<sup>13</sup>都不在沈毓桂任主編期間，因此在沈毓桂任主編期間，林樂知對《公報》的實際影響力是弱於沈毓桂的。林樂知本人在《公報》上發表的文章數量多，影響大，是在甲午戰爭期間以及戰後，即1894年下半年到1898年三年多的時間。林樂知的文章多達三十餘篇，幾乎全是時事評論的作品。林樂知在不同時期在《公報》上發表作品的多寡主要決定於他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看法，與沈毓桂是否任主編基本上是無關的。

12 即《中西教會報》。

13 《中東戰紀本末》由林樂知與蔡爾康編著，共三編，書中大部分文章散見於1894至1898年間各期《公報》。

其他西方傳教士發表作品的情況與停刊前相比沒有變化，仍是以慕維廉、艾約瑟、李提摩太、韋廉臣幾位為主。他們的作品以介紹西學為主，往往自然科學知識與宗教信仰互相混雜，例如慕維廉的《生命大道》和韋廉臣的《論人》，既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又將進化論與上帝創造人類萬物的宗教教條相聯繫。他們(李提摩太除外)這一時期對中國時政評論較少，即使甲午戰後也未有大的變化。

1889至1894年期間，《公報》的時政評論文章主要是由沈毓桂和華人外稿作者撰寫的。這一時期的華人外稿，都是有關西學、西政和鼓吹中國仿西方變法的，幾乎不涉及宗教。1889至1894年華人外稿作者共七十三位，其中僅八位是停刊前的老作者，而且發表有影響力作品的都是新人。《公報》華人作者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水平和批判水平與停刊前相比有了長足的進步，像「沽濱居士」的《政由俗革論》、「得一庸人」的《環游地球略述》、「寓濟逸人」的《局外閑談》等篇，無論從何種角度評價都足以與西方傳教士的作品相比美。這一事實也為廣學會所公認，1891年的廣學會年報中有如下的評論：

《萬國公報》和《中西教會報》穩固地保持著我們出版物的高尚風格，對實現本會的目的用處變得越來越大。前者包含很廣泛的內容，而且由於撰稿人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他們大多數都是在中國最有能力和最富有經驗的作家，所載的文章差不多都很適合時代，有力，令人發生興趣，因此也為廣大讀者所歡迎。<sup>14</sup>

廣學會將華人外稿作者與西方傳教士作者放在同等地位評價，說明華人作者與西方傳教士作者相比不再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在批判中國現狀和鼓吹變革中國方面，華人作者變得愈來愈有分量，愈來愈有影響力，成為沈毓桂力圖將《公報》辦成時論刊物的生力軍。除了時代背景的作用外，不能不承認華人作者羣是沈毓桂在長期主編《公報》過程中逐漸引導而形成的。

這一時期沈毓桂的文章與停刊以前相仿，都是以時政評論為主，不過他還加強了對西方民主政治的介紹。就個人而言，他的文章在數量上仍居首位，一定程度上維持該時期《公報》作為時論月刊的形象。他的文章對中國社會和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可從他辭職後發表在《公報》的兩篇文章略見端倪，他在1896年作的《廣學會大有造於中國說》中論廣學會的宗旨：「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sup>15</sup>這裏，「西國之學」的概念是廣義的，包含了西方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科學、技術等全部西方文明。他稱

14 《同文書會年報第四號》，《出版史料》，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協會編，1988年2期，頁62。

15 沈毓桂《廣學會大有造於中國說》，《公報》復刊第88期，1896年5月。

西學為「新學」，稱中國之學為「舊學」，這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中國流傳開來的文化概念，就是由沈毓桂此文首先提出的。「新學」與「舊學」一經沈毓桂在《公報》上提出，便迅速在中國社會流傳開來。梁啟超目覩這種情況，說：「教會之在中國者，亦頗有譯書。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欲求知識於域外，則以此為枕中鴻秘，蓋『學問飢餓』，至是而極矣。」<sup>16</sup>

沈毓桂1895年4月在《公報》發表的《救時策》中在建議中國各省會設大學，各府、廳、州、縣、鎮設中學、學院等西式學校之後，提出「夫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培養人才原則。這裏他首先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後來經過張之洞提倡，在中國社會得以廣泛流傳，儘管後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張之洞提倡和在社會流傳過程中已完全偏離了沈毓桂的原意。

這些例子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沈毓桂的文章在《公報》復刊後深受中國社會和知識界注目，儘管這也與甲午戰後中國的時局有關，是當時甲午戰後的時局所成全的。復刊後的《公報》作為廣學會的機關報既擺脫了經費上的困擾，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宗教的局限，對中國社會和知識界的影響已超過停刊之前。《公報》無疑是當時對中國社會各階層知識分子最具影響力的出版物，這不但對維新志士康有為、梁啟超來說是如此，就是對洋務派官僚後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張之洞來說也是如此。

1891年沈毓桂因病向廣學會和林樂知提出辭呈，因林樂知盡力挽留而繼續留任，同時林樂知還央求沈毓桂為《公報》代覓主編的後繼人選。1894年2月，沈毓桂正式辭去《公報》主編職，時年八十七歲。辭職後他仍在《公報》十多期上發表文章，他在《公報》上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是為林樂知去世而作的《美進士林樂知先生傳》，時間為1907年7月，當時他已是百歲高齡。為了紀念林樂知，《公報》在同一期還重刊了沈毓桂1889年2月為《公報》復刊所作的《興復〈萬國公報〉序》，這件事最恰當地反映了沈毓桂與《萬國公報》的關係。

16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載《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79。

# Shen Yugui and *The Globe Magazine*

(A Summary)

Yi Huili

In modern history,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ot only participated but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spread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itiated by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The Globe Magazine* (1868–1894) is a case in poi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magazine made by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hen Yugui, who was the person most important to the success of the magazine second only to Young J. Allen the proprietor. First, the article traces Shen's rise in position at the magazine. In 1868 when Young J. Allen first started the magazine, Shen was employed as an ordinary editor. In 1872 he became chief writer and then chief editor in 1878. Meanwhile,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of his rise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en and Allen. Second, Shen's work as chief editor (1878–1883) is examin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magazine was filled mostly with articles by Shen himself, and by some Social Gospel missionaries as well as with reprinted news. Shen's writings represented a trend of the magazine moving from news coverage toward political and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which dimmed its religious colour and was the chief reason for its close down in 1883. Last, the article deals with Shen's work as chief editor after the magazine resumed publication. In this period (1889–1894), the articles carried on the magazine were mainly from three sources: Shen's own writings, contributions from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writings of Social Gospel missionaries. Articles from the first two sources gave the magazine a strong flavour of political and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which not only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magazine's influence in the postwa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Chinese society, but also helped to fan the spark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deology into flames.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